

从“地域”出发——

笔谈(六)

新东北作家群中的黑龙江作家

——以杨知寒为例

□迟子建

2019年初冬在大连,辽宁师范大学与哈佛大学共同举办了一场“东北文学与文化国际研讨会”,王德威、王尧、张学昕、季进、宋伟杰、黄平、班宇等嘉宾与会。会议安排了四场讨论,华东师大的黄平在发言时,以“新东北作家群”来评述双雪涛、班宇、郑执等新锐作家的创作,与会学者积极评价这一新文学现象。记得我和张学昕主持最后一场讨论时,有位教授建议新东北作家群的青年作家,要多读经典作品,汲取创作营养,我半开玩笑地说,现在的年轻人可是喜欢“撕标签”的,班宇听后,一脸茫然。

其实这帮青年作家既有生活积淀,也不缺乏经典作品的照耀,其作品的光芒就是明证。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班宇的《冬泳》,是新东北文学代表性作品。他们在思想上不落窠臼,在艺术上天马行空,没有羁绊和束缚,一任才情挥洒,令人耳目一新。他们的文学无疑高起点,一出道就触摸到文学的命脉,找到小说之核以及与读者情感的共鸣点。

毫无疑问,被称为“铁西三剑客”的双雪涛、班宇和郑执,是文学的英俊少年。他们就像一场早来的春风,生气勃勃地融化坚冰,柔韧的文字还带有寒冰的气质,以超越他们年龄的稳健与犀利,开掘人性的深井,呈现了别样的北中国画卷。他们的小说也是近年影视改编的热点,无论是根据双雪涛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刺杀小说家》,还是由班宇担纲文学策划的《漫长的季节》,都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聚焦现实,直面痛楚,不回避矛盾与纠葛,能够捕捉冷色调的魂,在审美上有独到追求,他们的创作令人耳目一新。

在新东北文学的方阵中,有一位独行的女侠,并不逊色于前述的几位,她就是近几年大放异彩的“90后”杨知寒。我七年前主评第五届黑龙江少数民族文学奖,首次接触到她作品,是齐齐哈尔市作协推荐的《破茧》。读这本书时,我惊讶于一个20出头的女孩,能有如此成熟的语言,叙述老练,笔触收放自如,轻灵而不失深沉,有一颗沧桑心,仿佛活了几辈子。

自那以后,杨知寒和她的作品走进了我的阅读世界,只要逢着她的作品,总不会错过。她带给我的文学惊喜,使得我在作协常提起她来,感叹杨知寒是天才作家,我们要对好苗子做好服务工作。近年来她斩获了黑龙江两个重要文学奖——首届萧红青年文学奖和首届黑龙江文艺大奖,她也是入主黑龙江文学馆展陈系列的最年轻的作家,作品入选黑龙江作协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打造的“野草”丛书,同时是新换届的黑龙江小说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她的作品均发表于文学名刊,近年的各类文学排行榜,总闪耀着她的名字,《水漫蓝桥》《虎坟》《美味佳肴》《百花杀》等,收获了众多如我一样的读者。王德威教授和宋伟杰主编《东北文学读本》,我将《水漫蓝桥》在网上下载,转去推荐,他们读后对杨知寒的小说给予高度评价,她应该也是收录在这个读本里的最年轻的作家。何平教授尤其关注杨知寒的成长,特别寄来了译林出版社推出的《一团坚冰》。杨知寒以她的一支笔,英姿飒爽地走向文坛,成为黑龙江青年文学人才的领军人物。

前年作协召开全委会,我见到了杨知寒。她梳着齐肩短发,瘦瘦的,清秀安然地坐在一角,像个女学生。我过去与她打招呼,她只是点点头,绝无寒暄,看上去是个活在心灵世界的人。会议未结束,她为着赶赴一场重要的文学活

任何一个创作流派的形成和演进,既需要有石破天惊之力冲击出河流的标志性人物,也需要涓涓细流的浸润和汇入。在新东北文学创作的队伍中,以杨知寒为代表的黑龙江中青年作家,立足本土,以不同的姿态,融入这个洪流。但所有的汇入,都应是自然而然的,而任何一个文学流派能否长远,超越个人经验和地域观的更宏阔的视野,创作实绩的可持续性,也是关键所在

动提前离会,所以也没机会和她聊聊天。今年黑龙江文学院举办青年作家培训班,我见前来授课的老师名单中有张学昕教授,于是建议把班宇和杨知寒请来,一起在文学馆举办一场新东北文学的对话。

我再次见到了从杭州飞来的杨知寒。她依然一副女学生的模样,白T恤,休闲裤,参差的秀发像春天的柳枝,随意自然地飘动着。她看上去明媚了许多,目光里有柔和的光影。她告诉我结婚了,先生是大连人,我说怪不得跟上次见你不一样了呢。在人潮拥挤的中央大街上,一行人于傍晚散步到松花江畔,我们边走边聊,但每说一句话,都得扯着嗓子喊,街市实在太喧闹了。

杨知寒有异族血统,父亲是医生,母亲是文化工作者,我说你天生就是好作家的料子。她成长于齐齐哈尔,虽然定居杭州,但笔下故事依然是她熟悉的北国风物,时常回到故乡。不久前收到她寄来的最新小说集,捧读时有些句子让人忍俊不禁,如《喜丧》中的“胖子讲话有点憨,许是被脸上肥肉给挤的,眼睛眯成一线”,《黄昏后》“三七分的头发一颤一颤,茂盛得没分寸”,但《描碑》中“我上手给他眼皮顺下来,心,说,博,先到那头儿,先等吧”,描写死亡如此深沉内敛,又叫人心疼。年轻一代的女作家中,南方的孙频,北方的杨知寒,文学气质都与众不同,各自妖娆。



《一团坚冰》,杨知寒著,译林出版社,2022年7月

《黄昏后》,杨知寒著,中信出版社,2023年7月

前不久我在黑龙江文学馆主持了一场文学助力龙江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受邀的第七届合同制作家,不约而同提到杨知寒。其实以专事小说创作者为例,这届合同制作家中的孔广钊、梁帅、赵仁庆、刘浪等,虽不在新东北文学的评论视野中,但他们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成绩可圈可点。来自佳木斯的农民作家王善常在座谈中说,新东北文学不应遗忘乡土文学,我说其实萧红的《呼兰河传》和《生死场》,就是乡土的杰作。

任何一个创作流派的形成和演进,既需要有以石破天惊之力冲击出河流的标志性人物,也需要涓涓细流的浸润和汇入。在新东北文学创作的队伍中,以杨知寒为代表的黑龙江中青年作家,立足本土,以不同的姿态,融入这个洪流。但所有的汇入,都应是自然而然的,而任何一个文学流派能否长远,超越个人经验和地域观的更宏阔的视野,创作实绩的可持续性,也是关键所在。

梁启超先生曾慨叹过新文学运动对国学伤害过深,要知道他当时是积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文学运动和文学流派也让我想起一种罕见的垂筒花,它可以休眠多年,沉寂无语,最后会被一场意外的大火唤醒,而没有充分的准备和深厚的积淀,是迎不来这样的大火和涅槃的。我期待新东北文学更绚丽的花朵,还在后头。

近些年来,当代文学批评无疑一直在发展。无论是批评家队伍,还是批评文章数量,都在显著增长。但绝大多数的文学批评,都是满足于对作品的文化阐释,文学批评本身的作用、影响,以及对当代文论话语建构的能力,都越来越弱。其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批评的问题意识弱,概念翻新多。许多批评文章都是满足于某些作品的文化阐释,或者适当兼及一些审美分析,学术化和科班化的倾向特别突出,缺少感性丰盈、坦率直接的批评。这当然也没什么不好,至少体现了一代代青年批评家在专业上已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但我还是觉得,这类批评多少缺乏审美的敏锐度,尤其缺乏将具体作品与文学发展状况联系起来,敏锐地捕捉到文学发展的某些重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譬如当前非虚构写作在整体上与虚构文学、报告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很难看到具有重要的启发性分析。有不少批评还是过于强调概念辨析和新概念的建构,至于这些概念是不是或者会不会成为未来文学发展的重要方式,还很难具备说服力。

二是批评的共识性弱,整体意识不强。大多数批评各说各的,很难形成一些具有共识性的重要话题,也不能更多地推动有关文学思潮的形成和发展。我从事文学批评30多年,从来没有感到像最近十多年来的文学批评这样,极度缺乏共识性。共识不是随心所欲的点赞,而是充分关注他者的言说,并以他者作为否定性的存在,检视自我的言说。它是恢复不同观点之间不断共振的重要方式。但现在的很多批评,既无争鸣与反驳,也无话题的聚合度,只剩下无数的点赞,这一方面固然有问题意识弱,现象研究不敏锐的原因,但也有批评家整体意识匮乏的问题。批评家大多沉入各自比较专注的小领域,各说各的,互不借鉴,互动机制非常弱。像近年比较重要的文学创作,包括乡土书写的整体问题、科幻小说创作问题、非虚构写作问题、历史书写问题,以及孟繁华老师提出的情义危机问题,都需要持续性、共识性、多维度地深入探析,才能展示文学批评的作用和价值。在当代文学史上,有很多重要的文学思潮,其实是批评家对某些文学现象敏锐捕捉之后,在共识性层面不断推动创作与批评的积极互动后,最后形成了某种文学,甚至对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像先锋文学思潮、个人化写作等。但近十年来,文学批评在这方面几乎没有发挥什么显著的作用。

三是批评对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能力弱。应该说,不少文学批评家都有理论建构的意识,一些刊物也在努力引导某些中国式文学理论的建构,甚至开设了相关的理论研究专栏,但是,因为批评家对相关理论难以达成共识,各自为阵,所以很难形成相关理论的讨论、探索和建构。譬如,《当代作家评论》今年就开设了当代小说理论建构专栏,但其中的很多文章在主题上都比较散,缺乏集中讨论、系统设计,只是套了一个专栏的帽子,最后能不能形成一些相关的理论建构,很难说。本人也曾给《当代文坛》做过非虚构写作的专栏,并对这个专栏进行了非常认真的构想,包括每个小辑集中讨论哪些问题,但是很难组到合适的稿子,最后也不了了之。

同时,文学批评与文艺学之间的隔膜也越来越深,未能形成互动互构的良性状态。文艺学擅长理论建构,但大多并不熟悉当代文学创作;而批评家熟悉文学创作,又不擅擅长理论的推行,彼此在学科的壁垒之间遥遥相望,却难以互融互通。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

近年来文学批评的困境

□洪治纲



生活在城市里,如何有尊严地生存,如何面对衰老、适应孤独、对抗平庸,是每个个体都不可避免遭遇的生命困境。王芸是一个织梦者,她并不排斥时期性的、个体化的生命经验,并且执虚如盈,细密地观察、虔诚地追问,穿透寂寥冷漠的“水泥森林”,她捕捉到了灿烂繁复、具有诗性的精神之光,还有小人物身上近似于道的生命哲学。王芸的创作充分印证了在现代社会对纯文学的残酷考验下,有心人如何凭借一瓣心香,在纸上发现梦中的故土:时代在摧枯拉朽地前进,旧城旧人旧物不断地在巨大的力量面前退却,但是文学的长河恰巧就是在这种不断的变动里,妥帖安稳地保留着可贵的不变的东西。

“住在老宅子里的人,像朝向阳光生长的植物,珍惜阳光的可贵”,王芸的笔下,出现了不少离群索居的老年女性形象,她们如何在伤逝的恐惧之中维系着生命的秩序和尊严,是王芸创作关心的重要主题。“老去”是每个人不可逃脱的宿命,如何面对“老去”的时刻也是现代人的精神疑难。王芸敏锐地发现了生活中那些具有独特气质的人,精准地捕获了一个个生命情绪的“瞬间”,有绝对孤独的时刻,有超越了过往社会身份限定的惺惺惜惜,也有即将被世界抛弃的恐慌和抵抗。但是“老去”也意味着进入更真实也更内在的生命情境,宋词里说“老去惜花心,相对花无语”,看周遭朱颜辞镜花辞树,想起浮生急景难驻,自怜衰惫之意与宁谧平和的美学相互映照、相互生发,圣洁而温存的人文光芒也暗藏其中。《薄冰》里的乐曲,一个热情的抗议志愿者,在那段“时间如不断降落的粉尘黏附在鼻唇喉咙脏腑壁上”的日子

■第一感受

王芸《薇薇安曾来过》:

文学为变动的生活留住珍贵的不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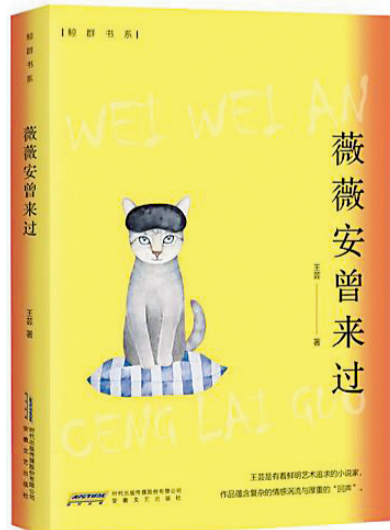
□黄小邨

里,走进了独居老人宋老师的世界。宋老师清冷孤僻,日日与琴声为伴,后来两人之间的隔膜逐渐消融,宋老师在乐曲患病的日子用琴声予以抚慰,“冰珠一样莹亮的音符,滚过人间,滚过他的心,洗去疲惫和厌倦,还有怨气和脾气”。他们之间的交往展现的是一个完全诗意化的、心灵化的世界,宛如暗香浮动的梦,在温柔良夜给人慰藉。你可能会惊讶于,个体生命升华到美学层面的瞬间,原来曾经如此真实、细微又深刻地存在于自己的生活之中。《薇薇安曾来过》里的张姨,“逆光坐着,花白头发叠着小窗的亮光,一身梦的气息”,暹罗猫薇薇安“一双蓝眼睛深邃、神秘,像迷人的梦境”,主人公和老去的张姨之间,和老去的薇薇安之间的互动,形成了一种至真至纯的托付,是最洁净的情操。在这里,人的生命和猫的生命互为表里,猫老去时的种种衰败的迹象,呼应了人临近去世时的那些至痛时刻,并且以一种收敛的形式娓娓道来,美学的慰藉也就隐藏在这种幽婉的形式之中。

在王芸的创作之中,“寄居”不仅是作为故事背景存在,而且具有叙事价值和象征意义。她曾经说过:“我们有限的一生寄居于这个实体的世界,只占据极其短暂、狭小的时空,可是对

于每一个人又是生命的全部。安放身心,是每一个人都回避不了的命题。让人们可以安放身心的居所,既是物质意义上的,也是精神层面的,细究起来,物质层面的居所易实现,精神的居所很难,有着更加复杂的内涵。”寻求身心安顿,正是王芸反复追问之中不变的生命哲学底色。她关注小人物与大时代的种种碰撞,关注缓慢的时光流程中每个平淡生命的喜悦或沉重,也关注城市孤岛之中人与动物的深情厚谊,正如这本书的书名,《薇薇安曾来过》,薇薇安不仅是一个名字,更是一种寻求身心安顿的方法路径:“薇薇安·迈尔,那个女人一生寂然,将自己隐藏在保姆的身份后面,直到死亡像一只手掀开了生活的层幕,属于一个女人凹凸毕现、曲折有致的人生,才被尘世的目光看见。”《绿鸵鸟》亦是以探秘的形式揭开普通快递员世俗生活屏障下隐秘而灿烂的精神世界,《局部有雨》则描绘了一群退休前绝无交集的老人从“交往”到“交心”的历程——他们从固守身份地位的防线,到不为声名所束缚所羁绊,只剩下一双清明的眼睛,向世间万物凝眸,那些细小的、幽暗的人性袒露的时刻,在作家的眼中,皆闪烁着别样的光芒。

在王芸的创作谱系之中,“寄居”也上升为



《薇薇安曾来过》,王芸著,安徽文艺出版社,2023年3月

一个纯粹的美学命题,它深深植根于中国哲学的深厚土壤,也展现了充满传统人文关怀的立场。中国文化讲究人与物“不隔”,从而由“大知”达到“大仁”的境界。孔子曾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道家“等生死,齐万物”,植物、动物、人都是共生的,生命的过程亦如四季流转,身份、规则所造成的种种局限就此打破。王芸热爱,也善于描绘动物,一只猫、一只蜜袋鼯,不仅是被书写和寄情的对象,也是人类世界的观察者。她在《异向折叠》里提到用一只猫小白的视角:“去记录那些即将离开上来窝,星散而去的人们,记录他们曾经在离窝度过的荒芜的、柔软的、活色生香又五味杂

陈”的时光。“寄居”之叹,也来源于梦寐与现实、离散与归乡之间的无限执念,表现为在探究城市的“物理”与“病理”之际,对其中的“伦理”要义的叩问。王芸用散文一样轻灵的笔触,让小说中的人物穿梭于层层的生命界面之间。意图重新定义他们安身立命的短暂栖居之地,但是她并不沉迷于抽象的抒情,而是寻求一种更加“微物”的创作方式,是生活细节的点滴记录,是世路人情百转千回,也是个人与命运之间无休止的齟齬与纠缠,比如《蜜袋鼯的夏天》,描写三个合租女性彼此间坚冰消融的经历以及与男人的情爱纠葛,不仅道尽了女性作为情爱主体患得患失的心情,也隐晦地传达了物伤其类的感伤:谁的心头没有一只为爱而死的蜜袋鼯?那些探讨女性曲折心事的笔触,流转如水银泻地,颇有动人时刻,有泪有笑。

对于作家来说,书写往往是迟来的、铭记生命时刻的仪式,也是一种弥补创伤、救赎遗憾的象征行动,在追忆似水年华中产生新的创作的欢愉,也为时代变迁留下了深泽不一的标记。王芸的写作以“寄居”为母题,写作原是寄托不可言之梦,但所形成的文字诱惑也让作者魂牵梦萦,不能自已,从而行文造境形成一种水上的书写,它的质地流动而轻盈,惆怅且欢愉,尽管追寻意义的徒劳感仍然挥之不去,但是她还是在苦苦寻觅那些更加根本、也更加艰难的寄托,那就是具体而微的爱,超越世俗的悲悯之心,舍我就彼、唇齿相依的脉脉温情,让我们不得不感叹,原来那股驳杂却强劲的生命之力始终存在于民间日常生活之中,并且让文学的“寄居”成为了可能。

(作者系青年译者、评论家)